



НИНА БЕРБЕРОВА
ЖЕЛЕЗНАЯ ЖЕНЩИНА

如铁红颜

高尔基情人的秘密生涯



〔美〕尼娜·别尔别洛娃 著 徐昌翰 高文风 译

《如铁红颜》有如一快经过打磨的玻璃，放射出水晶般的光辉。它像一面放映纪实影片的银幕，许多实际生活中的人物在上面活动，向我们传递着丰富的信息，闪烁着小溪般流淌的光辉。

——安德列·沃兹涅先斯基

北方文艺出版社

6.85

4

K835.618.5

БЕВ/1



НИНА БЕРБЕРОВА
ЖЕЛЕЗНАЯ ЖЕНЩИНА

如铁红颜

高尔基情人的秘密生涯

〔美〕尼娜·别尔别洛娃 著

徐昌翰 高文风 译



海淀走读 0058348

0058348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铁红颜/(美)别尔别洛娃著;徐昌翰,高文风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10

ISBN 7-5317-1293-8

I. 如… I. ①别…②徐…③高… III. 布德伯
格—传记 IV. K835.6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037 号

如铁红颜

——高尔基情人的秘密生涯

责任编辑 / 赵立程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邮 编 / 15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14

插 页 / 2

字 数 / 339 千

版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0.00 元

ISBN 7-5317-1293-8/I·1229

序：一部惊世之作

这部惊世之作我是 60 年代在巴黎读到的，当时，《如铁红颜》还不许带入我国。一夜之间，我狼吞虎咽般把它吞噬下去。在一大堆当时被我一口气看完的“腐蚀性作品”——那些热情洋溢的“反苏作品”，那些由于充满了思乡之情而变得特别美好因而显然变得特别具有腐蚀性的作品——当中，这本书以它如水晶般清澈透明的语言光辉吸引了我的注意。它的内容太不寻常了。

这部书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新风格的典型代表，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它就是 M·布德伯格男爵夫人那引人入胜的、充满文件般可怕真实的传记。布德伯格男爵夫人是一个迷人的女冒险家。许多世纪文学巨匠和政治伟人都曾扣开过她的心扉，其中有高尔基、威尔士、洛卡特、彼特尔斯等。她同乌杰索夫斯克—列欣科夫斯克的那位同名人一样，也是文学沙龙和政治沙龙里勇敢的穆拉，下的是世界规模的大赌注，风险一点不比她来得小。她是在克里姆林宫和西敏寺之间走钢丝的人。

有什么能同女性的力量相比？

瞧她那勇敢简直近乎疯狂！

有一张照片，画面上可以看到大胡子高尔基那腼腆的笑容，他正在把穆拉的友谊献给《两个世界之间的斗争》的作者。

其实并非女人如铁，而是那个时代——一个由铁的人民委员和铁窗构成的铁的时代。而这个活生生的女人就站在它的对立面

上。

女主人公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作者的注意呢？也许，“男爵夫人布德伯格”这几个字以含糊不清的口齿说出来时，同“别尔别洛娃”这个名字的发音听起来有点相似？那可怕的时代真使人不寒而栗。

这部长篇是别尔别洛娃最好的作品。她的文风有如水晶般清澈，有时略显主观，毫无感伤可言，品位上非常严格。它能显示出艺术家坚毅的性格和犹如狙击手那样准确的风格，一种女性的然而绝非弱者的风格。信息到了她手上就变得形象化了，成了信息小说，而不是新闻报道。她保存了艺术的那种具有魔力的红外光。这种红外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它的确是晶体，但是一种有魔力的晶体。今日好多纪实作家是释放不出这种红外光的。尼娜·别尔别洛娃对于把女性文学视为恰尔斯卡娅柔弱感伤的同义语是嗤之以鼻的。

去年春天，别尔别洛娃的这本书在巴黎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对俄国作家来说是少有的。《世界报》和多家大报对她的创作作了深入分析。著名的伯纳德·比沃在“呼声”栏目为她搞了个脍炙人口的电视专访。此前获此殊荣的俄国作家只有索尔仁尼琴。

我同尼娜·别尔别洛娃相识于20余年前，当时我国的一些朝圣香客还不大敢去拜访她。一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晚会，来了一位犹如金钱豹一样美丽的女听众。她那挺拔的腰身和言谈举止处处流露出彼得堡贵族的质朴。

我们的读者是通过媒体了解到别尔别洛娃的风格和生平的，媒体有时并不那么准确。她的散文是从后高峰派诗歌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诗歌的特点是嘲讽态度。有经验的厨师总是把煮好的米饭摊开，再用冰冷冷的水泼上去，这样做出来的米饭才能一个粒是一个粒，而不是粘乎乎的一团。别尔别洛娃的文字也是这样，它泼

上了一层嘲讽，每个词、每个字母都像是精选出来的米粒，发出珍珠一样的闪光。

她是率先高度评价B·纳波科夫重大作用的人物之一。她说，纳波科夫的出现抵得上整个侨民世界的存在。

我最后一次在普林斯顿演讲是去年。尼娜·别尔别洛娃手臂骨折，无法出席那个晚会，只好邀请我提前几小时先到她的家里访问。那是一座洁净得犹如船长舱的小屋，红葡萄酒泛着幽光。女主人赠送我一本她刚刚出版的著作——《人与床榻》。那是一本写俄国国外共济会的书。当时我写下了几行小诗。让我把它们引在下面吧：

您为我用左手签字，
并对此表示歉意。
右手箍在石膏中——
仿佛白色的瓷雕。

您在普林斯顿找到了港湾，
但是，白银时代的女神，
您那只被石膏禁锢的手
怎会像雪原那样停止了运动？

枫树叶儿凋落了——
像一串串夹子。
请收下我的歉意吧，
为了我没有箍上石膏的右手。

上帝啊，您黧黑的面颊——
那逃脱了肃反委员会的

像桃核一样的面颊——
它是多么馨香。

在我的眼前，立刻
女性富于弹性的胴体
变成了耸立在一座座
陌生花园里的石膏塑像……

山林女神，观景台。
夏园。雪白的脸蛋。
别尔别洛娃舒展的臂弯。
勇敢的军官古米廖夫
第一个挽起了她的臂膀。

尼娜·别尔别洛娃高兴得不得了。只是对其中的一句她说了一句：“安德留沙，我算什么白银时代的女神呢！”不过我并不同意她的意见。诚然，别尔别洛娃从来不属于白银时代的那一代——从总体上来说，她完全是另一种思维风格、行动风格和品位的人，然而说不上为什么，正是像古米廖夫和霍达谢维奇这样的白银时代忠贞骑士，却把年轻的尼娜·别尔别洛娃视为自己时代的女神。

她未能逃脱许多妇女的命运——追随伟大的艺术家走过人生旅程。在当代人的眼里，她有时被一些神圣的阴影遮蔽了。那些新闻界的大人先生们，有国外的也有我们的，常常在笔下把她们涂抹得满身脏水淋漓。

我想，《如铁红颜》的出版将会还一切以本来面目。这次出版的文本中，别尔别洛娃还补充了一些有关斯大林如何利用布德伯格的新材料。

去年秋天，别尔别洛娃在多年离开这片土地后首次归来。从清

晨到深夜，吸血鬼似的追星族、媒体、大学生和教授们络绎不绝地来拜访她，使她疲倦不堪。但她始终表现得精神旺健，思想活泼。她穿的是一件雪白的上衣，显得那样整洁。回答问题的风格同《如铁红颜》也完全一致——不讲空话，举止优雅，言简意赅，不兜圈子。我们有好多杜马议员真该好好学学她那种简明扼要的表达方法。

我曾有幸在莫斯科建筑学院大礼堂的台上给她的演讲当助手。礼堂坐满了莫斯科各界名流和大学生，这些人经常来此听萨哈罗夫和一些重要政治家、思想家发表演说。尼娜·尼古拉耶芙娜朗诵自己的散文和诗歌——她的，还有霍达谢维奇的——整整三个小时没有歇气。整个礼堂被她那具有魔幻般力量的俄语搞得如醉如痴。那是一种水晶般透明的语言，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已不多见，同时却清楚无误地表达着现代思想，格调清新，用词高雅。

少不了也有腥了一锅汤的“耗子屎”。这帮“耗子”看来是听到有人讲过《人和床榻》这部作品，便开始跟尼娜·尼古拉耶芙娜纠缠，想让她承认托洛茨基是……共济会员。其实他们很清楚这一情况。他们朝她喊：“他不是还戴了一只共济会的戒指吗？”

她的鼻翅嫌恶地扇动起来。她愤怒地瞪大了眼睛回答：“他算什么共济会？他可是个……”

这时，她降低嗓门，仿佛是在告诉大家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突然抛出了几个字：“……布尔什维克！”

她正是用这样一个最极端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把耳光狠狠地既打到了托洛茨基又打到了那群“耗子”的脸上。

让我们回到这本书上。祝贺你们，读者！

当年曾是禁书的《如铁红颜》如今已摊放在我国千百万读者的案头。某些当年的“坏书”如今得到了出版——有的已失去光彩，而有的却恰恰相反。《如铁红颜》有如一块经过打磨的玻璃，放射出水晶般的光辉。它像一面放映纪实影片的银幕，许多实际生活中的人

物在上面活动，向我们传递着丰富的信息，闪烁着小溪般流淌的光辉。

奇怪，《如铁红颜》到现在还没有搬上银幕。

安德列·沃兹涅先斯基

前言：魅力无穷的女人

“她是个什么人？”朋友们听说关于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扎克列夫斯卡娅一边肯道夫—布德伯格的这本书后，都这样问我。“是个玛塔·哈丽式的人物？还是露萨·萝梅式的人物？”

是的，这两个人多少都能在她身上找到一点影子：既有前一位女冒险家、女特务、女电影明星身上的东西，又有后一位俄国将军小姐身上吸引了尼采、里尔科、弗洛伊德的那股魅力。不过我不想评价或者谴责穆拉，也不想把自己对她的看法强加给读者，我不想对她宣读我的判决。我想做的只是把我了解她的一切全说出来。她的周围已经没有谁还了解她 40 年代甚至 50 年代以前的情况了。最近十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会不会有什么新材料公布出来？然而她的那些同时代人——那些了解她二战以前情况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先后去了。留下的那些人，对她的了解仅限于她自己说过的那些。仅有为数不多的人还记得她，还写写她的事，或是跟我提起她，但内容也仅限于有关她晚年的那几则老掉牙的趣闻轶事：什么她有多胖了，喝醉了的时候多么喜欢饶舌了……还有她喜欢给人家拉拉皮条，喜欢散布流言蜚语，有时简直就是个老妖婆了等等。^①

我跟她在一个屋檐下共同度过了三年，手头保存着一部分关于她的札记（不是日记，但却按日期存列，记录了某些同她的谈话）。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但不算亲密，也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在那遥远的年代，她出于许多下文还要详加说明的原因，对于 B·Φ·霍达谢维奇的友谊比对我的友谊要珍视得多（我比她要小

9岁)。

这里我写进了力图保留在记忆中的一切事实。我的资料来源是从1900到1975年之间的文件和书籍,它们帮助我揭示了她祖先的秘密,个人生活的某些细节,朋友和敌人的姓名,以及那一长串与她时而血肉相连时而藕断丝连的事件。在1890至1900年之间诞生的男男女女,几乎都卷入了这些事件,而且经常是悲剧性地卷入。环境和时代是我这本书里的两个主角。玛·伊·布(即穆拉姓名全称的缩略称呼——译者。)的两次婚姻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并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被俄罗斯的覆灭扭曲了,甚至中断了。穆拉是属于国家,属于时代,属于阶级的。在这个阶级中,每两个人就有一个被消灭了。穆拉斗争过,和解了,她活了下来。

在1938、1958和1978年我三次想要给她作传。她的一生有必要载入史册——青年时代,斗争历程,还有她怎么能活下来。这一生命历程的见证人如今看来已不复存在了。在英国,有几次她的名字还出现在某些人的回忆录、日记、信件中,再有就是出现在她刊载于伦敦《泰晤士报》的讣告中。人们所写的一切都是根据她自己所言。当我开始核对这些话时,我发现她一生都在编造历史。“我的那个时代”没有人怀疑这些话的真实性。不过我们都被她骗了。她同高尔基一道生活了12年,可在苏联文学研究中找不到有关她的任何资料。有那么三四个地方提到过她的名字,注脚里说,玛·伊·布德伯格(不提男爵夫人的头衔)娘家姓扎克列夫斯卡娅,第一个丈夫叫边肯道夫,短时间曾任高尔基的秘书兼译员。可能是外国人,一直住在伦敦,并死于当地。高尔基曾把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四卷本《克利姆·萨姆金的一生》献给她。不过,对这一献辞,从来没有给过任何注解。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她同第一个情人罗伯特·布鲁斯·洛卡特(后来的罗伯特勋爵)之间的关系——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词条提到这个人1918年的“阴谋”。也没有

人提到她同著名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士的关系——她在1933年到1946年这13年间，即高尔基离开俄国后威尔士逝世前这段时间，曾是威尔士事实上没有举行过婚礼的妻子。根据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尔科夫（此人于1918年9月亲手逮捕过洛卡特和她）回忆，她是“一个被称作穆拉的女人，是洛卡特的姘妇”，是在洛卡特的卧室里发现的。

这三个对玛·伊·布的一生起过重大作用的男人死后命运各不相同：洛卡特生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颇有魅力，言语机智，富有同情心。直至如今他的回忆录和日记还在不断引起人们的兴趣。晚年他成了名人，交际广阔，出入于上流社会。不过苏联作家们、剧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却把他涂抹得不成模样，说他是出卖灵魂的卑劣间谍，是唯利是图的傻瓜，帝国主义走狗，骄奢淫逸，不可一世。^②

赫伯特·威尔士活得很长，他的一生无数次成为传记和文章的素材，并因此对他的隐私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展开讨论，致使晚年备受不得安宁之苦。然而关于他同穆拉共同生活的细节我们却看不到有所涉及。我们知道她同威尔士长期有着亲密关系，并且对威尔士同俄国的关系以及后来他对十月革命产生失望情绪有巨大影响。这使得作家晚年生活蒙上了阴影。他30年代和40年代的作品苏联至今没有译本，苏联评论家只要一提到这些作品，总要说“它们充满了讽刺倾向”。他死前低沉的情绪，被说成是一个伟人终于确信唯有英国共产党才是他最后希望这一归于平静的心境的表现。

至于说到高尔基，居然到现在也没有一部传记。那本给中学生看的小册子（123页）当然无法算数。他的信件大多以摘要形式发表，而且远非全部。他的照片在通过审查时遭了不少殃。^③他同同时代人的关系被扭曲了。三卷本的《生平与创作纪年》充满错误，好

多地方对不上号：索引列出的姓名正文中找不到，而正文中的姓名在索引中又漏掉了；有时出发的日期列上了，但回来的日期却查不到（或是相反）；有时有信件没有发信人，有时有发信人却没有信件。1920年他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④但此事在任何地方均不见提及。有些资料说，他的第一位妻子叶·帕·别什科娃曾“打算在她不太忙的时候”（那时她87岁）写点回忆录，不过这回忆录她显然没有写出来。高尔基的儿媳妇，也就是他儿子马克西姆的遗孀，倒是“写”了回忆录的，可都是出自别人对她口授，并非她自己的手笔，因为她根本就不知该写什么。这些“回忆录”的每一页都充斥着日期和事实的错误。例如关于1931年8月她是这样写的：“当时高尔基前往巴黎参加代表大会”。实际上代表大会是在1932年7月，不是在巴黎，而是在阿姆斯特丹，而且那次荷兰政府干脆不许他入境。^⑤

还有，就在这本《纪年》中，我们竟发现高尔基同列宁相识的日期和地点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们是1907年5月7日在И·П·拉兑日尼科夫家做客时相识的（卷1，658页）；二说是1905年11月27日在《星火报》印刷所相识的（563—565页）；三说是同一天晚上在兹纳缅斯卡亚街高尔基寓所相识的——而且还附了一幅照片，说那座房子就是会面的地点。尤其是当我们在高尔基作品索引第四卷末尾（35页）竟找不到那篇著名的论列宁的文章（1924年）（后来曾多次被人篡改）时，这一切就具有了某种怪诞色彩。这就是苏联的文学历史资料。我说过，我们大家都被穆拉骗了。她撒谎了。不过，当然罗，这不同于村妇的信口雌黄，也不同于傻瓜的胡说八道。她精心思考的谎言编造得很聪明。在伦敦上流社会，人们都认为她是当时最聪明的女人（见哈罗德·尼科尔逊的日记）。然而，她所得到的东西并非她不费吹灰之力信手拈来，或撞大运撞上的。为了能活下来，她需要做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一个随

机应变胆大包天的人，而且，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包装上一层传奇色彩。

她爱男人，不仅是她的这三个男人，而且是所有的男人。她并不掩饰这一点，尽管她明白：说这样的大实话会使女士们对她嗤之以鼻，愤怒有加，会使男士们情绪激动，难以为情。她善于利用性，她追求新奇，知道哪里能得到这种东西。男士们也心知肚明，感到她身上这种东西的存在，于是便加以利用，并狂热而忠诚地爱她。她的情欲如火，不因道德考虑而受到约束，也不因装模作样的贞节观或世俗禁忌而有所“收敛”。情欲在她身上是那样自然，以至她无需学习，无需模仿，无需装腔作势。她从来不需要那种虚伪的性关系，为的只是要保持完整的自我。早在“完全的妇女解放”到来之前，她已经成了一个自由人。

在她的一生中，稳定的婚姻和孩子是没有地位的（她有两个孩子，那只是因为——据她有一次对我说——“所有的人都有孩子”）。亲属关系和家庭关系也没有地位。同时她也不具备对明天的稳定感和银行存款，没有对不朽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她同战后欧洲以及俄国革命后的那一代人没有区别。从许多意义上来看，她都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如果说这一生中她有所需要的话，那就是她的传奇，她编造出来的关于她自己的神话。整个一生她都在编织这个神话，为它包装，把它搞得滴水不漏。她身边的男人都是些有才华的、聪明的、独立的人，所以她也逐渐变得光芒四射，生机勃勃。她给予他们活力。她是一个行动自觉并对自己的每一点努力都负责的人。

死前她焚毁了手头的所有文件。那是二战后积攒起来、保存在伦敦寓所的文件。早期文件（1920—1939）早就被她收集到一起，送往爱沙尼亚的塔林了。德军撤退，苏军占领塔林时，它们已付之一炬（她是这样说的）。这是真话吗？难道她在向自己的女儿交代这

批文件下落时也撒了谎？很可能。也许，将来终有一天它们还会浮出水面？^⑥

我的任务是准确无误地记述，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样才能使我保持客观，而这也许是一个传记作者的本分。在出场人物当中，我给自己留了一个最小最小的位置。这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出于一种愿望：我希望把本书写成一本讲穆拉的书，而不是一本讲我同穆拉的关系、我对穆拉的感情的书。^⑦

我认识她时才 20 岁，动笔写她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当时我了解她吗？可以说了解——如果“了解”的意思就是三年中天天见其人，听其言，同处一个屋檐下。但当时我对她的了解远不如今天。后来我又了解到她那么多情况，思考了她那么多年，才认识到当年她在跟我们谈到自己时着意掩饰因而扭曲的真相。在那个年月，她给我们讲的全是神话，而不是她自己。不过，我不想排斥她的神话，也不想以真实取代神话，从而掩饰神话。我不想把这些神话抛弃。我需要它们，就像我需要真实一样。二者我都需要——它们共同构成了这本书。在那充满激情但同时也充满凶险的时代，她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姑娘。她生活的只是一个特定地域（那个地域虽然存在，但也仅是从地理意义来讲）。因此我们有权说，她的一生还是属于法国人所谓的那种“小历史”范畴的。

不过，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是否也该为“小历史”留下一块天地呢？难道，从 1914 年发生的事件开始，一切不都完全属于“大历史”么？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有两位大传记作者——两位欧洲大作家——给自己这一代以及后两代人立了个规矩，从而在这一整个领域内结束了混乱，并完成了他们革新和发扬光大该领域的使命：这两个人一个叫利顿·斯特莱齐，还有一个是他的学生安德列·莫鲁瓦。我是有意把他们称作大作家和大传记作者的。他们为写真

人真事、个人私生活和历史背景的艺术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并为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厦加固了基础。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想，现在他们的书恐怕已无人问津，立下的规矩也自生自灭了。其实，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倒会显得有些奇怪。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西方文化生活中的文学已变得如此繁荣（准确地说，应该是各种散文形式变得无比繁荣），以至我们不仅难得去碰那些古老的文学作品，甚至也很少去读本世纪初的作品。不过既然立过规矩，我在这里就要遵守。其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有任何虚构和粉饰，不能凭空想象，一定要言之有据，绝不能把想象当作事实。如果我用的词是“可能”，那就不能断言“是”或“不是”；如果我出的是谜面，那应该承认根本就没有谜底。

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特别是在美国，传记和自传体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作者和读者对这一体裁的兴趣完美地趋于一致，就像百年或百多年前这两个群体也曾以同样的热情对现实主义小说提出要求（或提出订单）一样。这里面没有神秘可言：这是对于当代社会中人的非个性化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情结的反应。我们对自己和对别人已经了解得太多，如今希望看到的是神话的深层含义。当代人被错综复杂的历史搞得如此复杂，但又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于是我们便都以一股无力自拔的劲头卷进了一场剥落神话面具的大运动，努力去探寻它们隐蔽的本质，去验证，去求索答案，深入结构。现在，秩序、制度和法纪——人的精神生活的基础——成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它们虽不能给我们答案，但却能把我们导向对时代和日趋复杂的历史所提问题给予回答的方向。

文学体裁的繁荣使两种相互矛盾的创作方法得以发展。使用第一种方法时，作者公开告诉读者：我把现实和虚构混在一起，你们就应该这样来看待我的作品。它不是写实小说，也不是学院派论

文，“我是在幻想的十字布上刺绣，以求娱乐各位。”这一创作方法的代表人物有特鲁曼·卡勃、克利斯托弗尔·伊舍伍德、诺尔曼·梅勒。某些评论家认为卡勃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伊舍伍德自己承认他向梅勒学习“粉饰事实”，他的那些自传体著作多少有一些“小说的成分”。在第二种创作方法中，一切都有根有据，都是档案文件式的：一页一页的文字下面缀满了文间注脚，有时这些注脚放在书尾，有时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大篇文献资料目录。里昂·爱德尔写的纪念碑式的《亨利·詹姆斯传》就是这类作品代表。他在一本书中写道：“作为传记作家，他的想象只允许是形式的想象。传记作家要对他所表达的事实负责。未经表达的事实是埋在地下的黄金。我要从两个方向来寻找真实：从场景结构上和心理再现上……把历史以传记形式再现，同时依然忠实于文献资料——这就是我的任务的微妙和引人入胜之处。”（《狮窟》，Ⅹ页）^⑧

我希望学习爱德尔的方法。我在本书末尾附了两个书目——一个俄国的，一个外国的。这些书（大约有300种）构成了本书的基础。我使用了其中的资料。但这远非全部：我的记忆力还好，它保存了我的过去，保存了玛·伊·布当年向我、向B·Φ·霍达谢维奇、向我们俩，以及有时向我们大家、向当年高高兴兴住在高尔基的家，住在萨洛沃、马里彦巴德、索伦托的那些人所讲的一切。^⑨

我在这里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如果读者还责备我写得不够，我也接受，认为有一定道理。不过我的确写出了我所能写的一切。假如我硬要写得更多，那就会触犯法律。假如将来有人对玛·伊·布的了解比我更多，我将很高兴。不过我看这不可能。

书中没有对话。有些引用的话是我在场的情况下说的。如果有时出现直接引语，不等于是我坏了规矩：它要么是见证人亲口对我转述的，要么是我从回忆录中转引的。一般来说直接引语都是以间接口气转述的。